

安徽省志办省志编纂处

安徽省电力志编辑室

12

新志評議文集

賴少其題

賴少其

1986

前 言

编修地方志是我国的优良文化传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拨乱反正和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恢复、党的工作着重点的转移以及安定团结局面的实现，迎来了盛世修志的好形势，在中央领导同志的倡导下，社会主义新地方志的编纂工作，在全国兴起，并取得了可喜成果。经过几年的辛勤笔耕，现在，新方志文稿，宛若百花园中含苞待放的嫩蕊，蔚然可观，煞是喜人。

编纂社会主义新地方志，既是对修志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又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怎样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材料编纂社会主义新地方志？社会主义新地方志应当是什么样子的？这是各级修志部门领导，和广大修志工作者以及方志研究者共同关心的问题。

近几年来，呼玛、台安、万年、如东、本溪、华池等县县志首批出版，还有一大批县志初稿和部分省、市志的大事记、某些专志讨论稿陆续写就，为我们提供了学习借鉴、讨论研究的对象。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中国地方志协会及时地组织了新编五县县志学术讨论会、全国北片十三省、市“县志稿”评议会、全国南片县志稿评议会、十城市志稿评议会和全国省志稿评议会，有的省和市、县也组织过各种志稿讨论会。通过这些讨论评议，已经初步总结了若干较好的修志经验，明确了这些志稿的优点、长处和取得的主要成绩，探讨了它们的缺点和不足及其改进提高的方法。用召开评议会的办法来提高修志工作者的理论和业务水平，提高志书的质量和功能，推动各地修志工作的顺利开展，促进马克思主义方志学的建设，事实证明，

这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新的方法”，也是地方志发展历史上的一个创举。随着这个创举的发展前进，最后还将促成方志批评学的建立，就象文艺批评学的形成那样。有鉴于此，我们搜集各地地方志刊物上发表的方志评议文章，选编了这本《新志评议文集》，以供各地修志之参考。

收集在本“文集”里的文章，除极少数篇目为节录者外，绝大多数都保留了本来面目，只对其中个别错别字和误用的标点符号作了改正。由于我们水平有限，所选文章内容有不当处，或者竟有遗珠未收；特别是评议县志的文章，因为数量多，而本“文集”篇幅有限，不少善篇佳作不得不忍痛割爱。

为便于读者使用方便起见，本“文集”中的文章共分为五组，首为评议志稿的总论，接着依次为省志、城市志、县志、山志的评议文章，而没有按一部综合性志书中各个篇目的序次进行编排。这样编排是否妥当，切望读者不吝指教。

地方志事业的前程光辉灿烂。我们怀着满腔的希冀和热情，以坚定豪迈的步伐，紧随着千万修志大军的行列，向着这个灿烂前程，奋进！这本《新志评议文集》，便是我们这种炽热心情的袒露，我们热切地希望她能为地方志事业的发展，发挥应有的作用。

全国著名书画家赖少其为本书题签，在此深表谢意。

编 者

目 录

开展方志评论 提高修志水平	董一博	1
新编地方志的标准问题	来新夏	7
浅议新志审稿标准	欧阳发	16
全国省志稿评议会议纪要		22
新省志内容不宜繁杂	齐景山	28
对新编省志稿的几点看法	曹贵森 管永星	33
《湖北大事记要》评介	李岳忠	42
对《山西煤炭志·概述》的几点意见	李裕民	48
山西煤炭志·概述(初稿)〈节录〉	山西省煤炭局编志办	51
试评《山西轻工业志》	李逢春	57
十城市志稿评议会纪要		60
评《淄博市电业志》初稿	于善同	72
读《武汉市志·金融》所感	王东伟	82
评议·修改·提高	王荣宝	87
在威海市志稿评审会上的总结发言〈节录〉	席星加	93
浅谈威海市志稿“人口”、“计划生育”章的问题	杜曰连	97
试论方言志的编写问题		
——兼评威海市志稿的方言俗语章	卞文成	101
对威海市志稿人物编的几点浅见	张万知	108
《嘉峪关文物志》读后	王文礼	113
新编五县县志学术讨论会纪要		
《中国地方志通讯》编辑部		117
全国北片十三个省、市“县志稿”评议会纪要		129
全国南片县志稿评议会纪要		137

为提高修志质量需要注意的问题	孙景悦	148
对呼玛、台安、万年、本溪、青冈等县志的浅见	李明	
	杨向东	166
一部有希望的新编县志稿	欧阳发	175
对《宁明县志》的几点建议	杨静琦	191
《宁明县志》所提供的借鉴	王自修 冯正肃	194
对新编《玉山县志》稿的浅见	欧阳发	200
评价新编《玉山县志》稿的几点意见	黄 菁	209
玉器已成形 精琢方为珍	林衍经	216
五台新志读后	傅振伦	225
《五台县志》的成就与不足	刘纬毅	230
关于撰写志稿的若干问题	林衍经	240
部分县地理志稿试评	邹文光	248
关于编写《气候志》的一些问题	李茂刚	265
对《襄阳县农业志》的讨论意见	《农业志》小组	270
《应山县志·水利志》稿的几个问题	曹健民	275
良好的开端		
——评《南冒县志·粮食志》第三篇第一章第一节		
	吴伟华	281
初评《宜城县志·环保篇》	李远柏	289
浅议《政法志》	欧阳发	296
如何编写县志《公安·司法》章	夏虎彪	303
对《随县志》军事编的看法	湖北省《军事志》办公室	307
对《竹山县志·广播电视志》的讨论意见		
	《广播电视志》小组	310
编写《卫生志》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乔富渠	314
新编《黄山志》稿读后	陈元方	319
编纂《黄山志》的几点体会	吕秋山 刘秉升	325

开展方志评论 提高修志水平

董一博

去年，我们在北京香山组织了新编五县县志学术讨论会，接着又在黑河和桂林分别召开全国南北两片县志稿评议会。与会同志都感到收获很大，其最大的启示是：“一人之才智有限，众人之智慧无穷”，不动不活，不辩不明，愈挖愈深，愈探愈清，借众人之力，走出了一条豁然而广阔的路子来。

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事业光荣、伟大，我们的任务艰巨漫长，在我们的面前有崇山峻岭，荒原草泽。我们这支队伍从“低谷”中起步，摸索走着漫长的征途。在这里，我们碰到了许多问题，不认识、不理解，甚至临深渊，履巉岩，四顾迷茫，傍徨却步，纵想听其所止，是难以休焉的。

但是，“众人是圣人”，“乘众智者胜”，群策群力，众志成城，把分散的群众智慧组织起来，通过纠谬补阙，开拓启迪，把大家共同感兴趣的问题和多年无法解决的问题集中起来，进行讨论，取得了统一或近似的认识。就是说，用群众的智慧动力，叩开了困惑之门！

本此，去年十一月和今年元月，又在长沙和武汉举行了全国省志稿评议会和十城市志稿评议会，同样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这种行之有效的方式，以及在全国各地方志刊物上发表各种批评和讨论文章，无以言之，姑名之曰：方志评论。

也许有的同志对此却并不了解，一听说评论，便心有余悸，大有谈虎色变之感，也有人认为，尔为尔，我为我，风马

牛不相及，何必尔尔，若然，风浪一作，从此必将沦于多事之秋矣！由于长期以来极“左”思潮的影响，产生上述思想是可以理解的，但并不是可取的。

我们认为，当前旧方志的整理和新方志的编纂，是我们方志事业上的双翼，他们相互借重。旧方志整理可以丰富和微证新方志的编纂；新方志的编纂，反过来又可推动旧方志丰富宝藏的开发。在一定意义上讲，旧方志整理应先于新志的编纂，至少应该同步进行。这样才能不致重犯错误，使各种问题得到顺利解决，对目前的某些状况会大大改观，尤其使新方志的编纂工作更会取得新的发展。因而，开展方志评论，总结经验教训，是当前十分迫切的任务。

方志是一个时代的标帜，同时，也标帜着那个时代的操觚者和评论者的水平。一个时代的名志佳本或是谩陋之作，固应首推编纂者，但是，尤赖评论家的慧眼妙笔，评其得失，论其正误，对是非、真伪及臧否问题，可质言而证，进一步对志观、志材、志法等得以述其究竟，将方志工作推到一个新的高度。同时出现一批方志评论家和出现一批方志编纂家，对方志史来说，是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

方志评论，不仅仅具有起生开路，纠谬补阙，扶正培本的功能，而且能积极热情地为旧志整理和新志编纂服务。它既能对旧志进行正确分析批判，又能大胆勇敢谨慎清醒地继承其珍贵之处，而对新志则能克尽扶持，明是非，定真伪，别臧否，休用建设，示人以康庄大道。

目前方志评论应该注意清除极“左”思想的影响，更新旧的观点。关于极左思想的影响，率皆憎而知其恶，人们大多深受其害，如谁胆敢借其名义而明火执杖地硬打棍子，谁就会被鸣鼓而攻之。但是，极左的阴影还在某些人的思想里潜伏着，

一有机会，又会戴上什么新面具，出来兴风作浪，因而，不能掉以轻心。

也有另外的情况，如与原则性的争论问题和平相处，竭力回避交锋，使评论陷于没有批评，没有矛盾，没有生机的境地，使工作迟滞不前，或在若干细小末节上喋喋不休，这同样会给方志评论的开展带来危害。也有把新生的，但还不够成熟的东西，不问青红皂白，大张挾伐，扼死于襁褓之中。

为了正常地开展方志评论，使之达到预期的目的，防微杜渐，我们对此作如下建议：

一、方志评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总结方志工作的经验教训，提高编纂整理方志工作的质量，进一步编好和整理好志书，使之更好地发挥方志的作用。这就非常清楚，开展方志评论是为了提高和发展方志事业，是为了团结方志工作者，清除基地，建造出更为宏伟壮丽的大厦，使方志更好地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

二、必须遵守四项基本原则。为了使方志评论正常而健康的发展，取得实效，应使大家明确，这种评论，是用什么思想来指导，遵守些什么原则，有无政策界线，使用什么方法，应抱什么态度，等等，促使大家得以遵守，保证评论工作的健康开展。

方志评论的提出，无非志在拨乱反正，扶正培本，即拨两千年来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唯上、唯书、唯人、虚无主义之乱，以反归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复原历史真实面貌，服务人民，服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正，这就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三、在学术探讨上，坚持人人平等。必须承认，对一切新事物的认识，新理论观点的形成，新事物的发明发现，都不是

一次成功的，因此，要允许探索者的失误，犯了错误或走了弯路，成功之后，才懂得失败是成功之母。对于方志理论探索者说来，主观随意，高人一等，盛气凌人的态度是完全错误的。我们主张共同研究、共同探索、虚怀若谷、相互学习，为共同制订最佳方案而取长补短。

四、坚持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原则。实事求是，从实际情况出发，求得正确的结论，这是讨论处理问题的最佳方法。《汉书·献王刘德传》：“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即所谓“务得事实，每求真是”的意思。我们讨论问题，不能从无原则出发，也不能从主观的教条出发，缩小它不对，夸大它也不对，只能从实际出发，客观事物是怎么样的，找寻其实质所在，然后以符合实际的、恰如其分的标准，衡量其是非真伪，才是平允的、公正的，而为大多数所能接受的，并以之同心而成其事。在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各种措施，都体现了实事求是和恰如其分的原则，故在“评”与“论”中间，应充分体现这一无往而不胜的哲学思想。

五、坚持满腔热情，肝胆相照。我们应当承认，地方志是一门新的学科，虽然有着古老的根底，但它还很幼稚，甚至不健全，没有完整系统和坚实的理论基础，它还不能健步如飞地登上学科的最高宝座，走起路来，还会不时的跌筋斗。无论是对老的专家、学者，还是对从事这一工作的新战士，都难保证绝对不会失误。因为这一学科的本身还不健全，尚处于摸索阶段，失误和犯错误是难免的。但是，我们既是进山探宝的人，就有责任也有义务满腔热情地支持别人的发现，毫不吝惜一切地去资助别人发掘。当然，也应该对错误提出自己的意见，如果自己是错误的，那就要老老实实承认错误，尊重对方的意

见。对他人的错误，应视为自己的错误，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帮助人家改正错误。对他人的成绩，应为之感到光荣，向人家学习，提高自己的水平，以自己的肝胆照别人的肝胆，以别人的肝胆视为自己的肝胆。

在研究探讨理论问题时，任何轻率和粗暴，都应视为忘记了一位理论工作者应有的尊严，因为对别人的不尊重，就等于不尊重自己。尤其是在讨论问题，发生严重对立而不能解决的时候，更应当注意这一点。所以说，善于求同存异，以理服人的泱泱大风是我们应提倡的优良学风。

由于地方志是古老的学科，而今它又以崭新的面貌出现，老问题固自很多，新问题也并不少，它真象个荒芜已久的园地，鲜花荆棘，珍禽害虫并存，而园丁们又大多是新手，业务陌生，时地不解，只有相互间的规约还不够，还应对开展些什么与如何开展等问题慎重研究。

方志本身是两千多年来的古老学科，一直在封建制度的漩涡里翻转，这就不免存在时代的局限性、认识的局限性和阶级的局限性，由此所带来的观点、方法和材料中的问题，也是可以想见的。

更由于方志的涉及面很广，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中及人文万事万物，从日月星到狗牛羊，深入到地层、水里、社会中的生产、生活，科学中的各个领域，以及各式各样的意识形态、政治斗争、思想斗争无不包括在内，这些问题的出现、存在、发展或消失，不仅有其自身的规律，也有与其他事物的影响，交叉或溶合，其中的是与非，真与伪，臧与否都有进一步探讨研究之处。

尤其发旧典、证群书，搜求不厌繁猥，以成方志的这一事实，自群经笺注起，地理专书、正史、别史、诸子、文集、说

部、诗词、古文物著述，以及图经、志谱、公牒、访册、报纸、杂志、记录、函电、日记等等，事事钩稽，或则访问故老，或瞻吊遗址碑刻，寻其究竟。还由于文献荡于水火，故老无闻于往事，潜光隐德，历久湮灭，以致稗贩沿讹，比比皆是，而其所带来的志观，志法及志材中的问题，及旧传统中的“贵因而不贵创”，辗转相抄的错讹更是俯拾可见，故而我们今天更不能不审慎对待。

开展方志评论，是我们二十世纪方志工作者打翻身仗的一支劲旅，必须与纂修、整理密切配合，获得相互支持，三翼齐飞，而评论更须做各方面的艰苦工作。评而有据，论而有理，这就需要扎扎实实地进行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工作，提高水平，培养人材。把这支队伍建设成为中国式社会主义的方志开拓者，自觉的、科学的先进战士，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以坚定的立场，清醒的头脑，科学的态度和战略家的眼光，进行评论工作，为提高整个方志工作的水平作出贡献！

（《中国地方志通讯》1985年第3期）

新编地方志的标准问题

来新夏

任何事情都要有个标准。标准是对一件事情要求的规格，对一个成品验收的卡尺。新编地方志当然也应该有个标准。近来有些地方志正日益接近完稿，就必然会提出这个标准问题。我为了试图解答这个问题，首先研读了几个新编县志。

一部是完成较早并已印行的县志。它曾在社会上引发过一些议论。对于议论，作者既无需坐立不安，旁人也不必侧目而视，如果几易寒暑写成一书，当提供社会后却报之以沉默，毫无反响，这才是真正地遭受冷遇和漠视；反之，如有些不同议论，甚至有较多的歧异见解和看法，则正说明这本书已引起了社会的重视。我就是因为听到了议论而去翻读这部县志的一位读者。这部县志遭受议论的主要点即在如何写政治运动问题上。这部县志在这方面写得多了些，不符合宜粗不宜细的精神。宜粗不宜细作为一条写作原则提出来是比较容易的，但具体掌握就很难。这条原则是不是可以解释为“存而不论”，即只叙述而不评论；只作历史事件的纪事，而无具体情节的描绘；只说明发生过什么事而不过多地去追本溯源。这部县志问题就在于描绘得太琐细，如写干部教师如何被斗，如何拔草，挂着什么牌子，唱着什么歌，甚至把“牛鬼蛇神”的嚎歌歌词也写进去了，这就不符合“宜粗不宜细”的精神了。

另一部县志分量不小，已经脱稿正待付印，我看到的是油印本。这部县志的不足之处在于没有处理好批判与继承的关系

问题。使用旧志资料本无可厚非，但全文照录的地方太多就会显得松散、拖沓。如在讲文艺的专篇中不惜用很大的篇幅，把地方上一个小戏的戏词全部录入，另外还用一部分篇幅录入地方戏的全部剧目。这些放在正文中就使结构难以紧凑。又如写名胜古迹，新的论述很少，而大量引用旧志中的吟咏诗文，这就失去了新编县志必须全面反映的重要特点，失去了新方志时代性的特色。

另外还有一部县志也已印行，但它比前两部更差，主要是没有具备一部县志的基本规格，只是一些单篇文字的汇集。所以这个县志有县志之名，无县志之实。尤其在人物处理上更为不妥。它违背了生不立传的传统与要求。这部县志写入不少活人，而且用了过多的誉词，其中某些人物还与编志工作有某些关系，这就不足为法了。

我通过对三部县志的研读后，深深感到目前很必要提出标准问题来商榷。那就是说，新编地方志成稿后究竟应该从哪些地方去考察、去验收。我对这个问题只是初步地考虑了几条，提出来和同志们商量。

我认为新编地方志应该从政治、论述、资料和结构文字四个方面来考察和衡量。

政治标准是首要的一条，它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

一个是指导思想问题。就是说，新编地方志应该在什么思想指导下进行编写工作。我认为新编地方志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做指导思想。这个问题首先应该研讨编地方志要不要指导思想。我看是要的，而且是必要的。因为一部志书内容广泛，涉及到社会和自然两个方面的诸种情况，我们既要在志书中全面而准确地反映本地区的各种状况，那就需要进行长期而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在这一过程中就有如何调查访问，如

何鉴别整理资料，如何分析资料，如何编写成文等一系列工序。在千头万绪、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自然状况面前，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做为指导，那我们的修志工作就会莫知所措，难以著手，也许又走向旧志编修的道路，或者更坏些。既然肯定必须要有指导思想，那就需进一步探讨：为什么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呢？我们修志究竟是为什么？我们修志就是为政治服务，为四化服务。为政治服务并非现在开始，历来的志书都是为政治服务的。旧志的前序中都明确地宣布自己为封建政治服务的观点，我们社会主义方志为什么不能公开宣布自己是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服务呢？我看，这种宣布是自然的、合理的，是不足为奇的。封建社会的各朝志书都有两条基本要求。一条是为巩固封建制度，统治者要从志书中寻求进行封建统治的资料依据。另一方面是为封建官僚制度服务，是为地方官提供“护官符”的依据。地方官不仅可以了解基本情况来进行统治，而更重要的是从志书中了解地方上的实力派和自己地位的维护者。我们的为政治服务，当前就是为四化建设服务，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服务，那又怎能不以指导我们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作指导思想呢？如果我们能在正确理论指导下达到以下各条，即：（1）全面反映本地区的历史和现状；（2）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3）进行爱国主义与革命传统教育的乡土教材；（4）能保存地方文献，储料备征。那就是一本具备基本标准的志书了。

政治标准的另一个方面就是政策要求。一个时代，一个政权都有自己的各项政策，并以其政策来处理各种错综烦杂的事务。旧志书中大书忠臣义士、烈妇贞女，就是封建朝代对人的政策。因此，我们的新编地方志也必须反映我们的各种政策要

求。我们在编写工作中应该用政策水平来再认识某些问题。比如，我们如何评价历次政治运动就反映我们的政策水平。有的同志曾主张把十年动乱写得特别具体，特别是受过委屈的同志希望多写些受迫害的情况。这是个人感情，而不是政策。感情不能代替政策。这当中确有一个如何掌握政治分寸的问题，万万不能以个人感情的要求为准。又如民族政策问题也要正确的掌握。我们写自治区、自治县的志书经常会遇到此问题。旧志中对民族问题采取歧视和污蔑的态度，我们则应正确地反映各民族的历史和现状，把各民族对祖国历史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进行实事求是的描述和评论。对历史人物只论业绩，不论民族。对历史上的民族纠纷和隔阂也不必回避。因为不写历史上发生过的民族压迫与歧视，就显不出我们社会主义民族政策的伟大与正确，只有认识到封建社会民族压迫的状况，才能珍惜现在民族大家庭的和睦相处。对待人的问题也是政策中一个很重要方面。我们在新编地方志中对人物立传与否决不能以地位高低来定立传的标准，而是应以人物对当时社会的作用作标准。地方志和党史、革命史是有所不同的。党史和革命史都写正面人物，而把反面人物作为对立面的背景来处理。地方志则既写正面，也写反面；既写推动历史的，也写阻碍历史的。为顺潮流而动、促进社会发展的人立传，其目的是为使他流芳百世；反之，为逆潮流而动、妨碍社会发展的人立传，其目的为使他遗臭万年。这就是地方志中的褒贬问题。关于是否为生人立传的问题，最近有些同志主张为生人立传，我们坚持原来的意见，认为作为学术问题来探讨可以暂不作结论，但在实际工作中还是不为生人立传好。因为给生人立传的话好讲，做起来却困难重重。试想一下，如为生人立传写得过分就有捧场之嫌，写得差一点，不仅本人不高兴，而且还有社会上各种因素的干扰，

甚至在写的过程中，还会有人“打招呼”。主张“生不立传”不等于不收集生人的材料。对生人可以“传事不传人”，比如一个工业劳动模范，为人所钦敬，有立传价值，可是遵循“生不立传”的义例在其生前先不立传，但在写工业志时可以把他的业绩贡献写进去，可以毫不避讳，如实写录。我们修志既不因人立言，也不因人废言，即使这位劳模日后出了“问题”，但他曾经做过的事还是要存其真实的，这才是正确地对待历史。保密制度也是政策性很强的一个问题。该不该保密，这是关系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应该保密是毫无争议的一致意见，问题在于掌握分寸，保密到何种程度？我曾和一位写军事志的同志探讨过这个问题，感到很难处理，不写高精尖的军事设施没有分歧意见，但写不写常规设备则有争论，有人说可以写，有人说国外情报人员，可以根据常规设备，分析出高精尖设备的程度，这算不算泄密，这个问题，写志部门很难解决，最好依靠有关主管部门来审批。涉外问题也是边界地区写志时煞费考虑的难题。我的看法是“议历史不议现状”，现实性很强的问题可先不议，但对历史上的纠纷则按历史真实面貌来写。这些政策性的问题都应属于政治标准中的另一重要方面。

第二个标准是论述标准。论述标准的第一方面是全面性，地方志是一个地区横断面现状的剖析，自然、社会各方面情况都应得到反映，使志书能够成为提供全面资料的一部书，如果有重大缺漏，那就是不完整。如果历史沿革、名胜古迹讲得很多，而工业经济讲得不够，那也是不全面。第二是时代性。新编地方志要突出特点，因为现在无论在社会、经济、文教、政法等等方面，都已经有了新的发展。我们不仅要写过去的历史，要反映“八景”、“十景”之类，更重要的是写我们时代的特点。有些同志认为写辉煌成就的热烈情景就是时代特点。

我看还不够，因为我们时代的特点是经过艰苦奋斗才有蓬勃发展的，所以不仅要写成就，而更重要的还要写获得成就的艰苦历程，这才是准确地反映，才能发挥教育的职能。要反映时代的特点就要有新材料，要搜集本地区最新状况的具体材料。如果写本地区现在的工业发展，而还用六十年代的统计数字，七十年代的报表，那就失去了时代性。八十年代的材料理所当然地不同于六十年代或七十年代。有新材料就比较容易体现时代性。反映时代性还牵涉到一个今古比例的问题，史志界中流行着“详今略古”的说法，这个口号是对的，但如何具体化？我想补充三句，即“详今略古，立足当代，回首过去，放眼未来”，这是否比较完整点？“详今略古”，不仅只是避免和旧志重复，更重要是为留下新时代的新材料。如果后人要了解本地区八十年代情况，只看我们这本志而无需旁求，那就是成功。第三条是地方性。地方性是由我国国情所决定。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地区性的差异很大：城市与农村不同，平原与山区不同，临海与内地不同，……还有种种不同，如同在河南一省，距离不远的开封与洛阳就各有地方特点，开封的水患比洛阳严重，洛阳的牡丹是全国的名花。所以，新编地方志从制订体例、编目到搜集资料、整理定稿都不能忽略地方性的问题。一部志书要表现特色，要区别共性与个性，最有效的办法是突出地方性。宋朝范成大所撰《吴郡志》之所以称为名志，其重要原则之一，就是突出了苏州的园林特色。这一点我们应该借鉴。“洛阳地脉花最宜，牡丹尤为天下奇”，如果新编《洛阳市志》中有《名花志》，描写了姚黄魏紫，那就非常有地方特色了。它不仅是艺术，还有科学，很多园艺流程既是珍贵的历史遗产，又是很好的园林参考资料。

如果一部志书能从全面性、时代性和地方性三个方面进行